

# 心佛眾生本一如念唯期顯自性

## 佛學大師梁漱溟先生二三事

沈鵬年

甲子新秋，梁漱溟先生的著作於神州大地絕响三十餘載以後，重播玄音，再放光華。其在浩劫中，不似達摩、勝似達摩，而撰寫完稿的《人心與人生》，自費於春江出版，國際學術界深為驚愕。日本和美國的學人譯為彼邦文本，弘化人倫，功德無量。這位受大苦難而特意獨行、百折不撓的現代新儒學開山和佛學大師，為探究中華民族文化的主脈及其內在生命的精神，益為世人崇敬。

一九四六年在南京和一九六〇年在北京，我有緣曾見先生，高山仰止之情與日俱增。由於無法抑制自己的仰慕之忱，便馳京請謁。自此得以時聆清誨，屢親警歎，在先生生命的最後五年間，幸運地聽到老人家無數次長談，還當場錄音。前輩咳唾珠玉，使我受惠無窮。

如今先生德無不備，障無不盡；永離諸趣，不生不滅。敬擇遺珠，求正大雅。

八十年代，先生寓北京復興門外木樨地新居，住在九層高樓中。陳設簡單，睡的是一張木板床。終年茹素，過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正中的客廳較為寬敞，兼作書室。書櫥中放着美國哈佛大學艾愷博士著《梁漱溟傳》、日本木村英一著《梁漱溟的思想》、小野川秀美著《梁漱溟與中國鄉村建設》、后藤延子著《梁漱溟的佛教人生論》；以及《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和《人心與人生》等英、日文譯本。此外，就是熊十力著《新唯識論》、錢穆著《師友雜憶》、唐君毅著《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徐復觀著《夢裏乾坤》以及其海外友人的贈書。靠窗有兩隻單人沙發，是招待客人的。他自己坐在舊藤椅裏，使用一張陳舊的老式書桌。梁先生經常在這裏伏案著述，我去的時候，他正好重新改畢《東方學術概觀》，寫好《中國文化要義》的《重印自序》，編定《我的努力與反省》等書。

居住九層樓雖不是「瓊樓最上層」，但因離開了塵囂，顯得安謐。窗外的蔚藍天空，不時飄過白雲。淡淡的一抹陽光，給人以溫暖。坐在梁先生對面，有一種「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的滿足，感到無比的幸福……。

我要向老人家請教的問題很多，然而千言萬語，一時無從說起。忽然想起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一百〇七頁上的第一句話：「梁漱溟先生……在和平談判中演了什麼角色？」——真相究竟如何？這倒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我便不揣冒昧地提了出來。先生不以為忤，耐心地為我作了講述——

原來在抗戰勝利以後，梁漱溟看到蔣介石邀毛澤東舉行會談，以為大局已定、和平在望，便打算脫離政治，潛心於文化研究了。不料發生了複雜而嚴重的東北問題，弄不好有爆發內戰的可能。和他一起組織民主同盟的朋友都勸他：不能坐視不理。大家說：「如果爆發了內戰，你還搞什麼文化研究工作？」真是無巧不成書，他和美國的馬歇爾將軍一樣，被硬拉出來，作為東方和西方的兩個「調人」，不約而同地出來調停國共和談。馬歇爾是基督教徒，梁漱溟則信奉佛家教義。他為了消弭內戰，拯民於水火，便勉為其難，在茫茫塵世捲進了現實政治的風雲漩渦，與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張羣、馬歇爾、司徒雷登等風雲人物頻繁交往。為了憲法草案問題、軍事整編問題、長春問題、蘇北問題、兩軍駐地問題、等等，他舌乾唇焦，疲於奔命，而蔣介石執意要打，張岳軍見風使蓬、馬歇爾七上廬山、司徒雷登「新瓶裝舊酒」……，經過與毛澤東密洞夜談，最後被周恩來當面批評，梁漱溟渡過了彷彿「駱駝想穿過針眼」似的艱苦歲月。我聽了非常激動，因為近半個世紀以前的這頁歷史，波濤洶湧，重新展現於腦海。尤其使我感動的，梁漱溟為了和平，心急如焚，根據民盟各領導人的共同意見，代表民主黨派（即當時的第三方面），草擬了一份關於國共雙方軍隊一律就地停戰和改組國民黨政府的程序

等問題的三條建議。蔣介石認為這是「幫了共產黨的大忙」而「不能接受」；周恩來則態度憤激地責備梁漱溟幫助國民黨「一同壓迫我們」，聲言「和平破裂先對你們破裂，十年交情從此算完」。當時梁漱溟真是慌了，急得茫然不知所措。梁先生告訴我：「幸而李璜幫我出了主意，分頭去孫科家中和馬歇爾住處取回了這些建議。我把原件請周恩來過目，並聲明作廢，周才歛容息怒。我也感到如釋重負。經過這一次曲折，我知道自己不行，便下決心退出調停工作。起初大家不同意，由於我的堅持，大家沒有法，只得讓我走了。」

有人說「戰爭本是吃人的大老虎」。梁漱溟以佛家「捨身飼虎」的精神為衆生謀求和平，却遭到左右各方的四面圍攻。我感到困惑。梁先生沉默有頃，一會兒，他又莊嚴地對我說道：「你感到奇怪嗎？你知道我一直信奉佛家思想的。我為衆生奔走國事，出世而入世，入世又出世，這是當局諸公不諒解的，也是大家所不理解的。……」



一個大智慧者的一語破的，點穿了我久懸心頭的一個謎。我歡欣萬分，請求先生更道其詳。先生微微一笑，拿起茶杯啣了一口水，繼續說道：「從佛家看來，人生總是與苦難相始終的。菩薩曰：『不捨衆生，不住涅槃。』世間萬象，要依衆生生命來顯現，這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其他生命；而佛家，則徹見衆生皆以惑妄而有其生命。凡衆生所賴以生活者，無非是不斷的貪取於外以自益而已。他（她）們於內執我，向外取物：我執、法執，是謂二執；所取、能取，是謂二取。凡此種種，皆一時而俱者，生命實寄於此而興起。佛家目之爲根本惑。根本無明，即謂由此而蕃衍滋蔓其他種種惑妄，至於無窮無盡也。故《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有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這『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即『無無明生，無無明滅』。也就是生滅托於不生滅，世間托於出世間。假設世間一切之非虛妄無實，則出世間又豈可能乎？所謂生滅法、世間法者非他，也就是一切衆生生命，而人類生命實居其主要也。」

接着又說：「如以做學問來說，則佛家以人類生命爲其學問對象，所謂普渡衆生，旨在從現有生命解放出來，以實證宇宙本體。自非徹達此本源，在本源上得其着落，則無以成其學問。從佛家來看，所謂『遠離一切顛倒夢想苦惱，究竟涅槃』者是也。」

梁老先生還說：「佛家之學，要在破二執——我執、法執；斷二取——所取、能取，從現有生命中解放出來。——自性圓滿，無所不足，成佛之云指此；所謂出世間者，其理亦復如是。然而，既有世間，豈得無出世間？有生滅法，即有不生滅法。如前所述，生滅托於不生滅，世間托於出世間。這就是我所持佛家思想的究竟義。當年，我正是本着這一「究竟義」奔走國事，調停國共和談。參加調停和退出調停，充當「調人」又不當「調人」，出世而入世，入世又出世……，轉瞬之間，世事滄桑，數十年過去了

。如今，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諸公，已先後歸道山；美國的馬歇爾和司徒雷登，也離開了人世。想當年舳艫千里，旌旗蔽空，一世之雄，今已不在了。反顧海內外，當事者存在，只有張羣與我了。毛澤東曾經問我：「跟張羣究竟是甚麼關係？」要我「交代交代嘛！」我沒吱聲。就是那麼一回事，有甚麼好「交代」的。不過，也許我和他有一種緣份，我的《人心與人生》出版後，他的舊作《人生論》也重新付梓。還是這句話：生滅托於不生滅，世間托於出世間，生者之於死者的一點故人之情，希望金甌不缺，功德圓滿，彼此也就心安了。」

辭別老人時，已經華燈初放。我隨着人流，遙望南天，猛想起一句古詩：「落日故人情。」——岳軍先生感應否？

## (二)

乙丑正月，適逢熊十力先生百歲冥誕。熊氏生前與梁先生情篤誼厚，我們的談話便集中在他們的交遊方面。

熊十力先生一代大儒，生平著作二十三部，長短文章一百多篇。《大英百科全書》稱他：爲當代中國哲學家的傑出人物。其門人弟子遍布海內外。梁先生說：「我生於公元一八九三年，熊先生比我年長八歲，生於一八八五年。」辛亥革命後，熊氏以熊子真本名刊行《心書》，於佛教較爲推崇，書中收有《記梁漱溟君說魯滂博士之學說》一文。後來他在《庸言》雜誌發表《札記》，從《淮南子》談到佛經，指斥佛家談空，使人流蕩失守。署名熊升恆。梁先生看了不以爲然，寫《究元決疑論》評議古今中外諸子百家，獨崇佛法，指名批評。此土凡夫熊升恆，爲「愚昧無知」……。一年以後，熊氏從天津南開中學寄信給梁先生，內稱：你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的《究元決疑論》我見到了，其中罵我的話却不錯，希望有機會晤面詳談。這就是他們的建交之始。從此以後，迄一九六八年五月熊氏以八十四歲高齡於劫難中病逝，兩人友誼逾半個

世紀。

梁先生說：「發生五四運動的那一年暑假，熊先生從天津來到北京，住在廣濟寺內，我去看他，一入手便論佛氏之學。他聽從我的勸告，同意研究佛學。後來我介紹他去南京支那內學院，跟歐陽竟無先生習唯識之學。他在內學院先後學了三年。我原在北大講印度哲學，蔡元培校長要我增講佛家唯識之學，我寫了《唯識述義》第一、二兩冊，由北大出版部印出。因顧慮可能妄談誤人，第三冊就不敢續寫了。壬戌初夏，蔡先生約我到他家中，討論胡適起草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同座有胡適，李大釗、陶孟和、朱經農等人。會後，我向蔡校長提出，夙仰南京內學院擅講法相唯識之學，建議去延聘一位講師北來。蔡校長表示同意，並委託於我。爲此有南京之行。初意我想聘請呂秋逸，時歐陽先生以呂徵爲得力助手，堅不肯放。熊先生在內院學佛三年，度其必飢聞此學，乃向蔡校長推薦，聘熊先生來北大主講唯識學。」

熊先生在《十力語要》和給友人的書信中，曾一再談到他在北京與梁先生的「論學之樂」，我便以此相詢。梁先生說：「熊先生此來後，與我朝夕同處者歷有多年。他先住北京地安門吉安所，後又與我同住西郊永安觀。甲子年夏，我辭北大，應邀去山東曹州講學，熊先生也辭北大同往；翌年回京，熊亦同回。其時我與同學十多人同住北京十利海東梅廠胡同，熊先生也來同住，自題其居處「廣大堅固瑜伽精舍」。在這期間，我們每天要舉行朝會，就是清早靜坐共讀。特別是冬季，天將明未明之時，大家起床後在月台上團坐。有時只見疏星殘月，懸於空際；山河大地，一片寂靜，空氣好極了，只聽見報曉公鷄在喔喔作啼。此情此景，使人感到心曠神怡，處於一種非常清醒的境界，更加覺得自己對於世人、對於社會責任重大，不敢有絲毫的懈怠。大家不一定講話，即講話亦不在多，主要是反省自己，利用這生命中最可寶貴的

一刹那，抑揚朝氣，振奮精神，砥礪心志。大家很快樂，熊先生也樂於相從。後來馬一浮先生賦詩贈熊十力，詩云「利海花光應似舊」，就是指當年「朝會」等論學生涯。丙寅年間，我和王平叔、黃良庸等偕同學十餘人，與德國學人衛西琴，同住北京西郊萬壽山大有莊，開始講《人心與人生》，大約年餘。熊先生也來相處，住勉仁齋。第二年南遊，我在上海會晤陳真如，即後來在淞滬抵抗「一·二八」日寇侵略的陳銘樞將軍。他信奉佛學而師事歐陽竟無先生。當時他陪我到西湖南高峯住了幾天，議論時政。熊十力和張難先等。也來相會聚談。不論是山東鄒平，還是四川北碚，我居處每有轉移，熊先生與我們均相從不離，親如家人……。梁先生談了他和熊先生治學上的分歧。我由於淺陋，沒有置喙餘地，只能如實記錄如下：

### 其一、「出乎意料」

梁先生說：「我們雖同一傾心東方古人之學，相交遊、共講習者四十餘年；在治學談學上却難契合。譬如北大的唯識學，我自己小心謹慎，唯恐講錯了古人學問，乃去聘請內行專家。不料熊先生才氣橫溢，不守故常。歐陽竟無先生是江西宜黃人，人稱「宜黃大師」。他提出法相與唯識兩宗，本末各殊，不容淆亂。叙刻法相諸論，震動佛學界。闡明宗義之成就，世所公認。他講《唯識抉擇談》，時在東南大學講課的梁任公也前來聽講，說「兩旬所受之熏，一生受用不盡。」熊先生從學三年，初作《唯識學概論》，計九萬言，分唯識、諸識、能變、四分、功能、四緣、境識、轉識諸章，據佛家本義，實宗護法，忠於內院所學。不料到北大以後，却一反內院之學，盛疑所宗，盡毀前稿，別標《新唯識論》，反對歐陽之說，實出乎意料。內學院劉定權作《破新唯識論》以駁之；熊再寫《破破新唯識論》而辯之。歐陽先生說「愈逞才智，愈棄道遠，過猶不及，賢者味之。而過之至於滅棄聖言量者惟子真爲尤。」彼此論辯往復頗久。最初除蔡元培、馬一浮稱道

外，佛學界人士無不責難。太虛法師和印順法師均著文批評。我對他的《新唯識論》，亦未敢贊一詞。

### 其二、稍加規勸

梁先生說：「這場論爭從三十年代持續到四十年代，熊先生與呂澂先生書信往返，辯論不休。熊先生自己說：《新論》文言本猶融《易》以入佛，至語體本，則宗主在《易》。呂先生說他：奪朱亂雅、揣摩以迎時好。熊先生把它寫的《與梁漱溟論宜黃大師》抄寄給呂先生，文中非議歐陽竟無先生「從聞重入手」、「心地不拓」，「以經師而終」；又在信中說「佛家之說」，「其妄誕處實不少」，「我對於佛，根本不是完全相信的」云云。呂澂先生責問他：「尊論動輒立異。談師則與師異，說佛則與佛異，……無往不異，天壤間寧有此理乎？認真講學，只有是非，不懶於師說、聖說、佛說，一概非之可也。不敢非而又欲異，是誠何心哉？」後來呂先生等人以《辯佛學根本問題》為題，發表了這組通信。我曾寫信給熊先生，我對《新唯識論》所以始終不發一詞者，即在「心為實體」這一點上，尚待商量。勸他體會如來「四十九年未說一字」之義。我把自已讀大、小乘經典的理解告訴他，他却說我讀書不得其法。對熊先生也曾規勸，熊先生不以為意，他說「矢心斯學六十年矣，其果內無所持而挾私逞異者哉！」我也就無話可說了。」

### 其三、直抒所見

梁先生說：「自毛澤東先生一九五三年發動對我的批判開始，我被排除在朋友行列之中，長期成爲一名不戴帽子的「反面教員」，動輒對我進行有組織的批判。我即閉門讀書。我看了熊先生的《體用論》等著述頗有意見，和友人林宰平先生談及，熊先生知道了，便來詢問，其時是一九四五年。我雖在被批判聲中，在回信中直抒所見，原信如下：

力兄如晤：連得一信兩片，知兄動氣。（苦哉！）弟前信

未及陳出所見，一面實是忙碌，欲寫而未成；一面正爲兄年高，怕有所刺激。不謂寥寥一二語，竟亦使兄動氣，推想或是宰平先生有信提及我如何如何邪？若宰老果已提及，而兄今又迫我必須說出，我再不說，那就更不好了。今於開會忙中寫此信，乞兄教之！我今問兄：兄將謂兄玄想此詞出尊著《體用論》之「空」與《般若心經》「照見五蘊皆空」是一事抑否邪？菩薩照見之空度一切苦厄，兄玄想之空果會除得自己身心痛苦否？我以為一則當眞證會本體，一則猶在六識緣影之中，遠遠不可相比。然兄似乎竟把佛家亦看同在作玄想，於是賞之曰「奇慧」斥之曰「詭辯」。當然我不否認佛徒末流（印度諸大論師在內）亦有修證實際不足而從玄想構思來做幫補者。但總是末流，未可代表佛家。是佛家之所賤，非其所尚。縱然兄之玄想構思有勝於此輩，亦何足貴？而兄顧高談大睨，自居於佛之上，明明還是個凡夫，何能令人心服？弟竊謂兄於著書中對佛家偏處（註：我不承認其偏），若委宛以申其疑問，最合自己身份，而且較之劍拔弩張之詞句亦更有力，未知兄以為如何也。至尊著成物章中有味於科學常識處不一其例，弟之科學知識正不多於兄，自不能備舉。兄於事屬科學實驗範圍者而以推論出之，猶自己說「這個推論或不至遠離事實」，豈不難哉！成物一章之失敗在此。勿覆不盡。……

在當時的處境中，爲了對朋友負責，也只能如此。」

### 其四、忠於學術

梁先生說：「熊先生著作甚富，晚年尤孜孜，屢有成書，每出書，必先以贈我。我讀之，曾深深嘆服，摘錄爲《熊著選粹》一冊。但讀後，心有不謂然者復甚多，感受殊不同。乃在一九六一年四月着筆，寫《讀熊著各書書後》，中間毀稿改寫多次，至七月初得其大半。又以避暑去海拉爾而擱筆。八月中回京續寫後半，

讀熊先生書後  
 我與熊先生相識，一經熊先生之學，以此相識，其學之深，其見之遠，其言之簡，其行之實，其心之誠，其德之厚，其量之宏，其志之堅，其力之勤，其功之偉，其業之盛，其名之顯，其德之馨，其流之遠，其澤之溥，其化之民，其功之著，其德之厚，其量之宏，其志之堅，其力之勤，其功之偉，其業之盛，其名之顯，其德之馨，其流之遠，其澤之溥，其化之民，其功之著。

又有多次寫出而復毀改或刪掉，至十一月中旬乃得卒成。全稿三萬餘字，內容分九節。即：一、先從一些瑣碎疏忽錯失處說起；二、為認清熊先生的思想路數再舉一些例證；三、試論我所不敢苟同復不敢抹殺處；四、我與熊先生彼此所見有合有不合；五、假若今天我來寫《原儒》；六、熊先生緣何有種種失敗？七、嚴重的失敗是其本體論宇宙論；八、在一個最根本問題上疏了神；九、我對熊先生的評價及其他。」

梁先生寫道：「我們總以為熊先生在學問上所以思路大啟，既得力於佛家，（此層熊先生屢屢自白之）《新唯識論》之作雖修詞立義不盡合乎舊師，而基本準據固自離不得。且從其著書最初計劃來看，……其量論之「量」即從佛家所云「現量」「比量」而來，則尊重佛家瑜伽功夫為佛學方法所在，又甚明白。像這樣，要將佛法從本體論、認識論兩面來闡明，其做法何等高超而謹嚴。——其實我們一切誤會了。我們誤以為熊先生在搞佛學，因而對他後來（特別是晚年）的一切懷疑否認，不免詫訝其入而復出。其實他乃是既不會入亦不會出。……他乃是始終站在佛法的外面，來玩弄那些理論而已。……始則他有所欣賞，轉而又修改它，末後卒於棄絕了它。熊先生把弄佛典數十年，就是如此。然而，其於佛法這真實的學問之全不相干，亦就明白了。」

順天賢友如晤  
 良慰知隨  
 猶記知去  
 善疾似未  
 慮性起居  
 近幸若白  
 真成指書  
 恆恆餘年  
 取書  
 花為留  
 梁先生  
 年過  
 時  
 望即  
 14

梁先生認爲：熊先生在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上疏了神，這就是「我執」的問題。……佛法徹始徹終只在解決這個問題，熊先生把弄佛典數十年，「我執」問題在其眼中、耳中、腦中、口中，來去應不止千次萬次，何能疏忽得？然而常言說的好：「熟視無睹」。他却真真地熟視而竟然無睹。……熊先生蔽於感情，不達出世之理，菲薄宗教，反對佛法，總緣他於佛家所說「我執」問題，缺乏注意和了解而來。（按：限於篇幅，事例從略——作者）

最後，梁先生充分肯定了熊先生學問價值之所在；指出其恣意呵斥古人，蓋由於大我慢。熊先生自來我慢特重，愚往昔曾進箴規，《十力語要》中尚存有答我之語。……三十餘年來勤於著述之業而怠於反己之實功，其勢只有助長，所不待言。……儒者爲學，原期以見性而變化氣質，庶幾於日用間恆有主宰，不隨境轉。乃熊先生一度見性，却不自勉於學，任從情趣亦即任從其氣質之偏，誤用心思，一往不返，隨年力之衰，而習氣愈張，德慧不見也。其用思辨理，愈以泥執成礙，不過表現之一端，試看其命筆屬文，不既已冗複累贅，雜亂無章，敗微滿紙乎？擲筆興歎，不勝慘惻於心。時爲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梁先生還說：如我所見，熊先生精力壯盛時，不少傳世之作。比及暮年，則意氣自雄，時有差錯，藐視一切，不惜詆斥昔賢。例如《體用論》、《明心篇》、《乾坤衍》，即其著筆行文的拖拉冗復，不即徵見出思想意識的混亂支離乎。我在《讀熊著各書書後》一文中，分別的或致其誠服崇敬，又或指摘之，而慨歎其荒唐，要皆忠於學術也。學術天下公器，忠於學術即我所以忠於先生。我不敢有負四十餘年之交誼也。

次年春，梁先生託王星賢先生將《讀熊著各書書後》手稿帶到杭州，請馬一浮先生審閱。一九六二年四月三日馬一浮先生復信如下：

漱溟先生侍右：星賢來，辱手教，見示尊撰《熊著書

後》，粗讀一過，深佩抉擇之精。熊著之失，正坐二執二取，驚於辯說而忽於躬行，遂致墮增上慢而不自知。迷復已成，虛受無望，但有痛惜。尊論直抉其蔽，而不沒所長，使後來讀者可昭然無惑。所以求其失者甚大，雖未可期其晚悟，朋友相愛之道，固捨此未由，亦以見仁者用心之厚。浮讚歎有分，夫何間然。尊稿仍囑星賢奉還，草草附答，敬頌道履貞吉……。

馬先生原來稱贊《新唯識論》：囊括古今，平章華梵，足使生肇（道生、肇僧）斂手而咨嗟，奘基（玄奘、窺基）橋舌而不下。此時却同意梁先生的意見。梁先生《讀熊著各書書後》，是三十年代以來佛學和儒學之爭的繼續。聽梁先生談話，如沐春風，使我受到莫大的教育。

### （三）

時逢丙寅，神州大地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已過去整整二十年了。梁先生歷劫倖存，重憶往事，非常安詳而坦然。

梁先生說：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來的，很突然，思想上沒有準備。物質上受了點損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戶，全國的千家萬戶，都受到騷擾。我的女人吃了苦頭，我還好，活了下來，歷劫嘛！所有的字畫、簡牘、圖書都燒毀了，這些都是身外之物，沒有甚麼。不過，思想是銷毀不了的！儒家的作人之道，在乎「精思力踐」、「踐形盡性」。能解決「二執」「二取」，那就成佛了。菩薩「不往涅槃、不捨衆生」。仍必回到世間來，踐其大悲宏願。因此，一個人不論學儒、學佛，都要在日常人事生活中求得鍛煉。只有時刻慎於當前，從不離開現實生活一步，去親切體認人類生命的「極高」可能性，「精思力踐」以求「踐形盡性」，消除「二執」「二取」，這就樂在其中了……。

梁先生說：起先批判《海瑞罷官》，我以爲像批判電影《武訓

傳》一樣，沒有甚麼。看了《人民日報》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感到吃驚和困惑。過了兩個月，林彪一伙利用青年人單純、無知、容易衝動的特點，煽動他們造反，「造反有理」。於是，破四舊、鬥黑幫，直至打砸搶，許多暴行都發生了。在林彪煽動紅衛兵造反的第五天，世界聞名的作家老舍和藝術家荀慧生等三十餘人揪出批鬥；到了第六天，他們找到七十三歲的梁漱溟先生家中。

梁先生說：那時我住在德勝門積水潭小銅井一號，在八月十四日，忽然有人來敲門，是附近「一二三中學」的紅衛兵。我忙說：你們是來檢查「四舊」嗎，請進來吧。領頭的訓斥道：甚麼檢查「四舊」，我們是來造反的！大家蜂湧而入，開箱、倒櫃、翻抽屜、撕字畫、砸古玩、燒圖書……，搞得不亦樂乎。我們梁家祖上三代：即曾祖寶書公、祖父承光公和父親巨川公的許多藏書，明清以來的名家書畫，以及無數文物古籍，被拉走了許多車，此外，統統堆在院子裡焚燒，燒了好幾天。這些東西，是我曾祖、祖父和父親當了三代京官所陸續購買的。其中有些珍本，對我們用處不大；我向來反對附庸風雅，對名人書畫也不感興趣。如果真是「革命」需要，要處理就處理吧。……不過有兩本工具書：《辭海》和《辭源》，是向四川一個學生借來的。紅衛兵也要燒毀。我告訴他們：這兩本書是借來的，工具書不是「四舊」，不要燒。燒了，我就無法歸原主了。他們不聽，硬把兩部書丟進火海。當時我心裏很不愉快，因為我將失信於學生，是我終生的一個遺憾……。

紅衛兵看中梁家的住房要作甚麼，司令部，把他們日常生活用具和衣服被褥全部車走。梁夫人要求留一點生活必需品……，被拳打腳踢，罰跪汰衣裳擦板的楞格角上。梁先生對他們說：你們要打，就打我，與她無關。紅衛兵就拖了梁漱溟遊街、批鬥……。他們一面批鬥，一面大呼：紅色恐怖萬歲。梁先生聽了

，心中無法平靜，夜裏也失眠了。梁先生說：國民黨反動派搞白色恐怖，殺害了李公樸、聞一多兩位，我當時是民盟的秘書長，曾代表民盟去調查此事。事後發表調查報告，譴責反動派。現在把芸芸衆生當作「牛鬼蛇神」，對他們實行「紅色恐怖」，怎麼得了呢？後來家裏人偷偷告訴我：在我們被抄家的當天深夜，老舍不堪凌辱，投太平湖自盡了。北京郊外幾個公社，五天中生活殺害的大小「牛鬼蛇神」三百多人，最大的八十多歲，最小的出生僅一個多月，有的人家被趕盡殺絕。有一千幾百年歷史的戒台寺大佛和數千尊小佛，全被砸光。著名的白塔寺和潭柘寺，遭到痛心的破壞。有尊千手千眼的千年古銅佛，被砸成了碎塊……，簡直理智泯滅，人性喪盡。——梁先生被折騰了將近一個月，最後關在南小屋中，勒令：他寫交代……。

梁先生說：我面對白紙，想到數以億、萬計的儒學書籍和佛家經典，化為灰燼而無益於世道人心，真有無限感慨。但是，思想是消燬不了的。大乘菩薩「不捨衆生」，回到世間踐其大悲宏願。我經過考慮，在白紙上寫下一個題目：《儒佛異同論》，時為

## 儒佛異同論

一九六六年九月寫出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裝訂

梁先生題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梁先生苦心孤詣，想通過論儒學佛之異同，喚人性之復歸，針對把一切眾生當作「一切牛鬼蛇神」和大搞「紅色恐怖」的種種暴行，寫下了《儒佛異同論》三卷。我拜讀了梁先生的手稿，受到極大的感召。根據梁先生的指教，我體會到這樣幾個方面：

### 首先，闡明儒、佛的根本立場，從不離開人來說話。

梁先生針對現實生活中把人不當人的現象，開宗明義寫道：「儒佛不相同也，只可言其相通耳。儒家從不離開人來說話，其立腳點是人的立腳點，說來說去總還歸結到人身上，不在其外。佛家反之，他站在遠高於人的立場，總是超開人來說話，更不復歸結到人身上——歸結到成佛。前者屬世間法，後者則出世間法，其不同彰彰也。……兩家為說不同，然其為對人而說話則一也；……進修提高云者，正謂順乎此生命本性以進以高也。兩家之所至，不必同，顧其大方向，豈得有異乎？」

### 其次，闡明佛學中人生有「兩面」和「兩極」的不同。

梁先生針對現實生活中發言「紅色恐怖」暴行而寫道：「人生却有兩面之不同，亦且可說有兩極之不同。何兩面不同？首先從自然事物來看，人類生命原從物類生命演進而來，既有其類近一般動物之面，又有其遠高於任何動物之一面。復次，由於客觀事實具此兩面，在人們生活表現上，從乎主觀評價即見有兩極。一者高極：蓋在其遠高於動物之一面，開出了無可限量的發展可能性，可以表現極為崇高偉大之人生。……一者低極：此既指人們現實生活中類近於動物而言，更指其下流、頑劣、奸險、凶惡遠非動物之所有者而言。它在生活上是暗淡醜惡的，又是苦海沉淪、莫得自拔的。」

### 其三，闡明佛家的「作人」之道。

梁先生針對現實生活中出現「禽獸之歸」的現象寫道：「佛家期於「成佛」而儒家期於「成己」，……亦即俗語所云「作人」。……

然而作人未易言也，形體機能之機械性勢力至強，吾人苟不自振拔以向上，即陷於俱生我執、分別我執重重障蔽中，而「光明廣大」之心不可見，將終日為「役於形體」而不自覺，幾何其不為禽獸之歸耶？還寫道：「人類遠高於動物者，不徒在其長於理智，更在其富於情感。……必情感敦厚深醇，有發抒，有節省，喜怒哀樂不失中和，而後人生意味綿永，乃自然穩定。」

### 其四、分別闡明人生之苦、苦樂轉化和生命自主。

梁先生從老舍之死聯想到眾生的苦難，特意寫到「人生之苦」說《般若心經》總不過二百數十字，而「苦」之一字，前後凡三見。自佛家看來，人生是與苦相始終的。但苦與樂是能轉化的，他寫道：「在受苦後輒易生樂感，掉轉來亦復有然。其變易也……，量變積而為質變，苦極轉不見苦，樂極轉失其樂。……更重要在於生命自主，他寫道：「苦莫苦於深深感受厄制而不得越。一切苦皆從有所執着來。執着輕者其苦輕，執着重者其苦重。……生死禍福，誰則能免？但得此心廓然無所執着，然果我執之不存也，尚有何厄制可言乎？」人類生命具有自主變化之無限可能性，故終不足以厄制乎人也。」

梁先生始終認為：佛法是人生之學。他最後寫道：「佛家作為一種反躬修養的學問來說，有其究竟義諦一定而不可易。……淺言之，即因勢利導，俾眾生隨各機緣，得以漸次進於明智與善良耳。」——他在浩劫困厄中花了二個月寫成三卷《儒佛異同論》，正是體認了人類生命的「極高」可能性，精思力踐以踐形盡性，充分發揚大乘菩薩「不捨眾生」的精神，隱劣顯勝，實大聲宏，為世間一切眾生重明慧炬，指點迷津。其大智大悲，無量功德，固亦獨步神州，光耀千秋。這部手稿，當時即已冲破重重阻礙，輾轉化為手抄本流傳於北京、上海、四川及東北等地，成為善男信女們歷劫度厄的精神力量。

梁先生心似明月，碧澄皎潔，天真靈性，舉世莫匹。丁卯重陽，按我國傳統，是他高齡九十五歲壽辰，全國政協要為他祝壽。他說：「自己誕生，為母親受難之日，何足為慶？所以一向不願做壽。」辭謝了有關方面的盛意。在此期間，他以一代大儒和佛學大師之尊，慈心三昧，化為甘霖，諄諄教誨一個二十五歲行將出國深造的青年，使她在進入世界聞名的高等學府之前，先在祖國受到一次深刻教育，如此善緣，令人難忘。

這個青年就是月新，「文革」爆發時年僅四歲。她看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不少中外名著，萌發了研究比較文化的興趣。她考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比較語言文化學位後，出於對梁先生的崇敬，專程前往晉謁。梁先生親切地同月新作了重要談話，講了這樣幾個問題：

### 其一、為甚麼要給孔子和儒學鳴不平？

梁先生說：「我一生倡導孔子之真，反對盲目批孔。比較主要的，是二十世紀初期和「文革」期間的幾次。民國六年，我二十四歲，蔡元培先生聘我到北京大學任教，先講《印度哲學》，後來又講《儒家哲學》和《唯識述義》。同事中有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高一涵、陶孟和諸先生，他們崇尚西洋思想，反對東方文化。我與他們朝夕相處，感到精神上壓力之嚴重。難道中國文化果真一無是處嗎？問題不可忽視，非求出解決的道路不可。我到校長室找蔡先生，問他對孔子持甚麼態度？蔡先生說，我們並不反對孔子，儒家學說作為一門學問，是必須認真研討的。我說我這次進北大，除了替孔子發揮，替釋迦發揮而外，不再作旁的事。蔡先生表示同意。我就系統地閱讀儒家書籍，認真的思考和研究，認為儒家孔門之學，有消極一面，更有積極一面。不能全盤否定。對於孔子，我很同意周樹人即魯迅先生的看法。他說：孔子在生前頗吃苦頭，死後却被種種權勢者用種種白粉給他化粧，抬

到吓人的高度，帶累孔子也更加陷入悲境。他還說：因為袁世凱、孫傳芳、張宗昌這三個利用孔子作「敲門磚」，因此從二十世紀開始以來，使孔子的運氣很壞。事實確實如此。周先生還說：不能厭惡和尚，恨及袈裟。我很贊成。當時大家反對袁世凱稱帝，反對張勳復辟；整個文化界「打倒孔家店」，反對儒學，也形成高潮。從「厭惡和尚」而「反對袈裟」，學術界涉及孔子和儒學都羞澀不能出口。在這種情況下，對孔子和儒學本身，若非我來鳴不平，有那個出頭？反對袁世凱等權勢者和正確對待孔子，是兩回事，不能混淆。「文革」中因批林而批孔，把林彪和孔孟之道劃等號，甚至把後世的「吃人禮教」也算在孔子賬上……我說假如「吃人禮教」起着壞作用，孔子亦不任其咎。正如同一切學馬克思主義者若陷於教條主義錯誤，馬克思絕不任其咎；那麼，後世所形成的禮教，又何得歸罪孔子？我的立場，就是始終堅持實事求是評價孔子。五四時代我宣揚孔子之真；「文革」期間我堅決反對批孔。對中華民族文化妄自菲薄，全盤西化，是要不得的。為了反對洋教條、破除洋迷信，我首先把中國文化納入世界文化的總體結構中平等地論述，這就是《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成因。書中有不足和錯誤，我是但開風氣不為師。有人說這本書是二十世紀初年產生的現代新儒學的開山之作，這是過譽。」

### 其二、甚麼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主脈？

梁先生說：「何謂文化？中外古今的學者專家給它下的定義，有二百幾十種。我在《中國文化要義》中是這樣寫的：「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幾十年來，我沉潛於人生問題，反覆於出世和入世，涉獵於東西百家，對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西洋文化的特點是「人對自然」；中國文化的特點是「人對人」；印度文化的特點是「人對自己的生命」。你（指月新）問我：究竟甚麼是中國文化即中華民族文化的主脈？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我曾寫過：「中國文化自很古時候到後來，中間

以孔子作個樞紐：孔子以前的中國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裏；孔子以後的中國文化又差不多都由孔子那裏出來。」在《東方學術概觀》中我也寫過同樣的話。這就是說：在中國上下五千年歷史中，孔子生活在前二千五百年和後二千五百年的中間。他接受古代文化，又影響於後代文化，起了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爾後儒家之學，遂歸之於孔門，稱爲儒者孔門之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源遠流長，影響深度，構成了中華民族文化的主脈。《易傳》云：「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歷史上能夠連綿數千年而不斷，體現了它具有一種「可大可久」的內在生命力。創造新文化，不能輕率地一刀割斷中華民族文化的主脈。」

### 其三，略略思想傾向爲何？會三歸一、佛家爲主？

梁先生說：「任何一個人的思想，不會一成不變，總是要發展的。五十年前我在《自述》中談過自己一生有四個不料。就是：一不料自己從小厭嫌哲學，而到北京大學講《印度哲學概論》，終被人視爲哲學家；二不料自幼未讀四書五經，而後來變爲一個擁護儒家思想、贊揚孔子的人；三不料我家幾代生長在北京，是城市人，而成爲從事農村工作，倡導鄉村建設運動的人；四不料鄉建運動竟與民衆教育或社會教育爲一回事。從四個不料的經歷中，我的人生思想或哲學觀點有三度變化。最初受我父親影響，我父親的思想與詹姆士、杜威等思想相近，對世間一切，認爲有用即好，無用即不好，有點實用主義。其次從十九歲至二十八歲，在順天中學受同學郭人麟的影響，讀了不少佛學書。我在《思親記》中寫道：「自民國元年以來，謬慕釋氏。語及人生大道，必歸宗天竺。」此時以佛家出世思想爲主。到北大以後，看了大批西洋哲學書，更系統閱讀儒家典籍，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由佛家思想轉入儒家思想。自己省察，在第一期可謂西洋的思想。第二期可謂印度的思想，第三期可謂中國的思想。彷彿世界文化

中的三大流派，都在我的腦海中巡迴了一次。你（指月新）問我：思想傾向爲何「會三歸一」以「佛家爲主」？因爲儒家之學乃人生實踐之學；而佛家之學是人生解放之學。兩家之學雖同爲人生之學，其救世精神兩家更有相通之處；但大乘佛法出世不離世，利濟羣生，至全人類徹底解放，則非復世間境界也。故我由佛轉儒，而內心所持，仍是佛家精神。」

### 其四、佛家之學爲甚麼是人生解放之學？

梁先生說：「稱佛家之學是人生解放之學，乃簡而言之。應該說佛家之學是世間迷妄生命的解放之學。佛家看人生，不外是起惑、造業、受苦。衆生我執，便是起惑。無我得而強執着者，故是惑也。世間萬象要依衆生生命以顯現，佛家則徹見衆生皆以惑妄而有其生命。生命活動不斷貪取於外以自益，衆生賴此以生活，於內執我而向外取物。我執、法執是謂二執；所取、能取是謂二取。佛家之學要破二執、斷二取，從現有生命中解放出來，故謂解放之學。小乘出世，偏而未圓；大乘菩薩「不舍衆生」，出世而回世，宏揚佛法，普渡衆生。小乘有五蘊四諦之說。五蘊者色、受、想、行、識。色指身體，受指感受，想指思想，行和識則指生命流行的本身。四諦者苦、集、滅、道。苦有生老病死諸苦；感業苦因即集，集爲苦之本。此二者住世間之法。消滅人生之苦必得修道，道乃寂滅之本。此二者出世間之法。大乘佛法五蘊皆空、四諦不立。有如《般若心經》一切皆空：「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乃至「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即對一切的否定。在實踐上不捨衆生，乘願再來，出世間又回到世間；出而不出，不出而出，方爲圓融。在上乘基礎上大乘更進一步：生滅托於不生滅，世間托於出世間。根除「我執」，必在「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改惡遷善，離苦得樂，不經假借，徹達出世，依賴所依賴混合無間，由解放自己而完成自己，自心清淨，至性圓滿，無所不足，社會上自覺自律成風，圓融無碍，到達智慧彼岸，人

類徹底解放，亦即諸佛之所由以成佛之道也。由此可知，佛家之學就是從世俗迷妄生命中解脫出來的出世間法之學。簡言之，佛學爲人生解放之學。

最後，梁先生對於月新赴美攻讀比較文化表示支持。他說：「人與人，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交往，都離不開文化的交流。文化交流是人類不斷前進、永遠向上的希望之一。」還說：「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如果處在封閉的孤立狀態之中，不能不枯萎。而每一個國家之所以有最成功和最優秀的民族文化，大都要依靠自己的和外來的因素，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棄之。經過不斷的豐富、補充和發展，使自己的文化更加優秀、更加完善。」還說：「只有保持自己優良的，吸收外來積極的，反對所有消極的，才能更加顯示出自己文化的特徵，而樹立我們民族的聲望。」梁先生詢問了月新去美國的行程，語重心長地說：「文化繼承要擇善而從，文化交流要擇善而從，對古今中外的



文化進行比較研究，也要擇善而從。既然文化的傳播和交流能激發最抽象的思維體系；那麼，比較文化工作就可能爲人類思想發展史帶來一種不可代替的貢獻。願你（指月新）學業必成，好自爲之。」梁老把他的新著《東方學術概觀》和《我的努力與反省》親手題款送給月新，還和月新合影留念。（見附圖）月新依依不捨拜別梁老，梁老親送至門口。暮色蒼茫，北京城已經萬家燈火。月新深情地說：「梁老先生真不愧爲『萬家生佛』。」

### （五）

丁卯戊辰冬春之交，我爲編寫《梁漱溟研究資料》，留京匝月，向梁先生提出了幾十個問題，又同他老人家作了十多次長談。梁先生回憶了近百年來他在政治、文化、教育、新聞等方面的親身經歷，敘述了他平生交遊的許多史實，特別對他過去寫的文章中沒有提及或故意略去的一些人物和事件，更作了詳盡的補充和說明。有一次，他和我談到了馬一浮先生。還從馬先生「文革」中遭劫而死，進一步談了一個人對待生死問題應持的態度和應有的境界。

梁先生說：「人、貴有自知之明；「人」、尚在未了知中，即「Man, the unknown」是也。就是說：我們對於自己，貴在能自知；但對人類生命的認識，則還在認識很少、很淺的階段。至於生死禍福之事，人所必經，又莫測難知。其最爲牽動擾亂人的感情和意志的，也恰恰在此。世俗以生、福爲喜，以死、禍爲悲。殊不知「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一個人從結胎到身死，不過是其生命一個段落的起訖。生命決非胎生而起始，亦非身死而告終。有何悲喜可言？人生活動固然不能無借於此身；然而此身雖死，生命却並不遽絕，決非死了就完。相似相續，非斷非常，乃是人生的實況。一般說來，人死於此，即生於彼，故佛門以死爲往生極樂世界。梵語稱死爲「涅槃」，中文意譯爲圓寂。何謂圓

刹那為梵語之音譯，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經九百生滅，此即刻不停地變化流行，早經之謂，生命如是，宇宙如是，曰九十，曰九百，以九代表其數之多耳。宇宙如是，曰九十，曰九百，以九代表其數之多耳。宇宙生命是一事，非二事，以為多人時刻在空間中生活，要知道空間只涵括在時間內，大化流行，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生生不息，生命是相似相續，非斷非常，以為今天的我，猶是昨天的我，便是常見，俗以為人死如燈火滅，玄不復存在，便是斷見，常見與斷見皆非也。

寂？德無不備稱圓，障無不盡名寂。佛家所說永離諸趣，入於不生不滅之門。死者乃其幻身，本性不生不滅，涅槃永生。若悟此理，何足悲懼？一切全在一悟字。悟者即頓悟，頓者即一刹那……。

從「刹那」一詞，梁先生又談到「常見」，「斷見」之非。他說：「刹那為梵語之音譯。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經九百生滅，此即刻不停地變化流行之謂。生命如是，宇宙如是，曰九十、曰九百，以九代表其數之多耳。」「宇宙」、「生命」是一事非二，莫以為吾人時刻在空間中生活，要知道空間只涵括在時間內。大化流行，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生生不息。生命是「相似相續，非斷非常」。俗以為今天的我猶是昨天的我，便是常見；俗以為人死如燈火滅去，不復存在，便是斷見。常見、斷見皆非也。」

梁先生特地把這段話寫給了我。（梁老手迹見附圖）  
梁先生還說：「古人有「千古艱難唯一死」之歎。一個人臨死

時能從容清醒很不容易。所謂「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究其因，無非由我執而有「煩惱障」；由法執而有「所知障」。二障原於二執，二執變生萬象而有二取。於是，二執不破、二障不除、二取不斷，一個人處於迷妄之中便無法從生死中超脫，當然難以從容清醒。但是，能從容清醒而視死如歸的，也大有人在。比如：宋代高僧道濟，俗稱濟顛和尚，其臨終偈語是：「六十年來狼籍，東壁打到西壁。而今收拾歸去，依舊水連天碧」。近代高僧弘一法師，原名李叔同。早年文章驚海內，是絕世才華的藝術家和教育家。出家後成為第十一代律宗祖師。他預知死期，力拒醫藥延長生命。一九四二年秋給友人寫信：「朽人」於九月初四日遷化。（其時尚未死）曾賦二偈：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

問余何適？廓爾亡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他們的境界都很高。還有馬一浮先生，在「文革」中受到沖擊折磨，書物掠劫一空，誣為「封建遺老」，——其實他是中國從德文讀《資本論》原著的第一人。批鬥後被勒令搬出長期居住的西湖蔣莊，在安吉路棲身。一九六七年夏抱病寫了《告別諸親友》，詩云：

「乘化吾安適，虛空任所之。形神隨聚散，視聽總希夷。

。。

漚滅全歸海，花開正滿枝。臨崖揮手罷，日落下崦嵫。」  
這和他原來所撰聯文：「心行處滅，凡聖情盡；言語道斷，文字性空」是一致的。他的境界也很高。所惜者，是熊十力先生。他受到沖擊後，不能象馬先生那樣看得開。上海的造反派批鬥京劇表演家言慧珠時，拉了熊十力先生去陪鬥。熊先生認為奇恥大辱，憤而絕食。後來他在住處立了孔子的牌位，膜拜自責。他本來已經不信佛學了，此時却天天唸誦《往生咒》，冀求往生極樂。他的神志不清，有點昏昧了。可見臨死時的從容清醒，確是不易

梁先生還談了他自己。他說：「費爾巴哈有句話很妙，『唯有人的坟墓才是神的發祥地』。人死後先求入土爲安，佛家涅槃也以荼毗爲安。人之安命，莫此爲甚。過去的朋友中有精於『子平之術』的，曾說我甚麼『三歲起運，安命辰宮』。我付諸一笑。說笑話：辰年該是我的荼毗爲安之期。一個人的壽命，確實是有限度的。『大限』者大去之限度也。你（指筆者）希望我活過百歲，上次月新來時也說等她學成回國來祝我百歲壽長……。謝謝你們好意，但這是不可能的，我距大去之日不遠了。陶淵明《歸去來辭》：『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我也頗有同感。」

我想起了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對梁先生那些不實事求的「批判」，問他有何看法？梁先生說：「漫天風暴無聲，萬頃江海無波，事情早已過去了。我一貫認爲要破執、除障、斷取，從來沒有放在心上。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如此而已……。說畢，梁先生把這兩句話寫給了我。（梁先生手迹，見附圖）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我問梁先生，是不是像弘一法師、馬一浮先生那樣，能否預先寫些偈語，留示後人？梁先生聽了一笑，說道：「我從小受父親影響，精思力踐，踐形盡性，從不吟詩作詞。說到大去，我希望是：『心佛衆生本一如，念念唯期顯自性。』……。梁先生應我的要求，把這兩句話寫了下來。（見附圖手迹）他說：『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是佛家恆言。龍樹《心贊》：『諸佛出生處，墮地獄未滅，成佛原未增，應敬禮此心。』禪宗大德云：『即心是佛，佛即是心。』又云：『有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至於衆生，與佛原自無別，其別只在迷與悟之間而已。衆生自性是佛，固未

嘗以迷而改；一朝覺悟，依舊是佛。心又與生命同義，而心大於身。世之落於斷見者，只見其身，無見其心。其實，人身固有限而人心實無限也。因此，古人有詩云：『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而明儒都謂：『身在心中。』我很欣賞王陽明的《詠良知》詩：『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按：梁先生手寫的這兩首詩，見附圖）自性從

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  
笑從前顛倒見枝葉，外頭尋。  
吾聲吾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  
拋自家吾畫藏，信內托鉢效寬兒。

廣義講，即生命本性，在生活實踐中既是道德；又是不斷向上奮進。我說的「顯自性」，是涅槃時「滅却意志，歸於虛無，心定神凝，內顧返視而萬緣滅寂」。我希望自己大去時能做到這一點。在大去之前，觀音教義說得好：『衆生渡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我住世間一日，仍要莫知其所然的精思力踐。一個人如果失去其向上奮進之生命本性，便落於失道而不德。

(六)

在梁先生和我談話的三個月以後，江南鶯飛草長，百樹生花。梁先生爲即將在香港召開的「中國宗教倫理與現代化」學術研討會撰寫發言稿，題目《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闡述了儒學、倫理、天下太平等中國傳統思想的現實意義。他說：『天下太平這個精神最偉大，是人類的理想；中國此種傳統精神與現代化不相沖突，它在空間上不分地域，在時間上無論何時，均合情合理。』戊辰谷雨後五日，梁先生感覺身體不適，去協和醫院檢查，發現患了尿毒症，留院治療，病情緩解並有所好轉。

也寫了「二母爭子」的故事，斷訟之憑藉和方法與三部《灰欄記》的完全一樣。

(王)見二母人共爭一兒，時王明點，以智權計：今唯一兒，二母爭之；聽汝二人，各挽一手，誰能得者。非其母者，於兒無慈，盡力頓牽；所生母者，於兒慈深，不忍拙挽。王鑒其偽，詘出力者，強謀他兒。即向王首。兒還其母，各爾放去。(原出《賢愚經》第十一卷)

可見，《灰欄記》在歐洲的廣泛影響，它的淵源遠不是十三世紀的元代，而應當直接追溯到六世紀初的這部佛學類書和更早的漢譯《賢愚經》中。

其實，關於中印文學的關係源流等問題早已引起了前輩學者的關注。陳寅恪《三國志》曹冲、華佗傳與佛教故事》、《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吳曉鈴《西遊記》和《羅摩延書》等都對此有所論述。魯迅在《痴華鬘》題記中寫道：「嘗聞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國藝文，往往蒙其影響。即翻為華言之佛經中，亦隨在可見……」又道：「尊者造言」，雖以正法為心……智者所見，蓋不惟佛說正義而已矣。魯迅並由激賞佛經故事而捐刊了《百喻經》，足見其遠見睿識如是。

佛經中大量的文學作品，是屬於全人類的文化。《經律異相》一書博採廣搜，鉤隱闡微，條分縷析，集中滙編了眾多的異相故實，更由其編纂年代之早，特別是還保存了大量的已經失傳的經文，因此更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當我們以一種現代的、開放的意識來進行文學研究的時候，是不能不注意到這部古代的、開放的、巨大智慧的作品，在中印文學、中外文學的比較研究中所處的重要地位的。(完)

《經律異相》一書，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上接第22頁「心佛眾生本一如、念念唯期顯自性」)

梁先生住院兩周後，醫院提出手術方案。小滿節那天，梁先生平靜地向家人說：「人的壽命都是有限度的。醫生治得了病，却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經完了，壽數就是這樣了。不必要勉強去延長生命。」五月七日，台灣《遠見》雜誌記者到病房探望梁先生。記者告訴梁先生，她在台灣上大學時就讀過先生的《中國文化要義》。她只向梁先生提出一個問題：「您對台灣青年有甚麼希望？」梁先生答道：「注意中國傳統文化，停了一下又說：『順應時代潮流』。五月三日，台灣大學教授章政通特來病房拜見梁先生，他是在台灣出版《梁漱溟思想綱要》的作者，他說此次來北京只想拜見梁先生。梁先生說：『對不起』、很抱歉。六月五日，中國宗教倫理與現代化學術研討會在香港正式召開，在研討會的開幕儀式上，首先放映了梁先生關於《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講話錄音和錄像。這是梁先生住世間的最後一次公開講話。六月六日，醫院通知梁先生的家人，準備在三日為先生做手術。六月三日晚，梁先生對他的兒子說：「我的壽數已經很高了，大概到此為止，不要勉強採取措施……。要家人應該看得開些。家人問先生還有甚麼話要說？梁先生只回答：『火化』。六月三日上午二時，梁先生的心臟跳得很快，醫生們為他量血壓、做心電圖……。梁先生對丈夫說：『我想休息了，我要安靜……。梁先生真正在「心定神凝，內顧返視而萬緣滅寂」中，於十一時三十五分心臟停止了跳動。——大乘菩薩不住涅槃、不捨眾生的精神，梁先生躬行力踐，完全做到了。在紐約的月新獲悉噩耗後打來長途電話，哽咽的聲音要我代她送輓聯。七月七日上午九時，北京的天色晦暗，落着靡靡細雨，正在舉行向梁先生遺體告別儀式，靈堂設在醫院裏。梁先生的遺體安在翠柏鮮花之中，容貌仍像生前那樣安謐慈祥。靈堂正門兩側，懸掛着大幅隸書對聯，聯文是：百年滄桑，為國救民；千秋功罪，後人評說。正中的橫額是：中國的脊梁。佛學大師梁漱溟先生永垂不朽！」